



SHANGHAI

CHUBAN

GAIGE

40 NIAN

上海 出版改革 40 年

上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

编著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74辑

上海出版改革

40

年

上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出版改革40年(上、下)/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编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444-7409-2

I. ①上… II. ①政… ②上… ③中… III. ①出版工作—体制改革—上海 IV. ①G23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5703号



责任编辑 邹楠 戴燕玲
封面设计 陆弦

上海出版改革40年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 编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44 插页 4

字 数 580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409-2/F·0021

定 价 168.00元(全二册)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编委会

主 编：马建勋 徐 炯

执行主编：祝君波

副 主 编：王建华

成 员：赵书雷 上官消波 张 霞 章立言 涂美龙

郝宗绪 邢 宪 包红英 孙海燕

出版说明

出版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时代进步的动力。在社会分工中,它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但其创作和生产的图书、杂志、唱片等产品,又是受众极为广泛,层次相当多元的,因而对社会产生着巨大影响和积极作用。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其鲜明的成果是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其中出版物在推动思想解放,传播社会主义正能量,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满足人民文化娱乐,以及促进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简单地概括,出版物包括教科书、学术专著和大众读物,在过往的40年,在服务于我国教育事业、科学研究和大众文化生活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之于其他载体,它更具有春风化雨、滴水穿石的长效作用。

当我们历数出版对社会影响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过往40年的变化,还来自行业内部的改革、开放和出版人的努力。

我国出版有很好的历史传统。在民国时期,上海曾是全国的出版中心,高峰时有出版社300余家。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店等著名出版机构,当年均创始于上海而盛。后来,我国的出版移植了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比较强调出版的政治性,而否定它多元的文化功能;比较强调出版的计划性,而否定它的市场性。这种模式和思维导致了“文革”时期出版社数量急剧减少,年出版新书品种日益下降,内



容雷同单调,行业内部缺少活力和动力。很多出版人回忆当年书店无书卖,人们无书读的日子,至今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盛世再起。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出版事业也发生了时代巨变。以图书品种为例,全国近几年已达到或超过了年出版新书 25 万种,跻身于世界出版大国行列。不仅品种大幅增加,而且内容丰富,质量提高。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出版重镇,也成了全国出版改革的缩影。以行业内部结构为例,传统图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杂志社、印刷业、发行业、版权产业、对外图书交流、数字出版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经营管理方面,计划经济的出版模式,已被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新型出版模式所替代。出版业与非公经济合作,出版业与世界出版界的交流也成为常态。中国的出版物也更多地走向国际,出现在法兰克福书展、英国书展、美国书展、博洛尼亚书展等世界著名的书展上,更多地进入世界各国的书店和图书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视窗。这几十年,一些代表出版改革开放的新概念也不断出现,标志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比如出版社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社长负责制、出版双效益考核、编辑职称评定、出版社自办发行、图书版权贸易、民营书店、民营印刷厂、外资印刷企业、故事会、贝塔斯曼书友会、数字出版、文化走出去、多媒体融合、中国最美的书、China Joy、上海书展、出版社事业转企、集团化改革、大学出版社强社之路等,都先后在上海呈现勃勃生机。有的作为阶段性成果影响全国,有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出书、育人一直是上海出版的传统与责任,过往的 40 年,上海图书精品迭现,人才辈出,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上海市政协秉承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工作要求,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近年来广泛征集改革开放时期的“三亲”文史资料,要求当事



人把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有价值的史料如实写下来,传之于今人和后者,旨在为领导干部管理国家和社会积累经验,提供资政服务。

有鉴于此,自2015年以来,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和市新闻出版局联合发起上海出版改革“三亲”史料的征集工作。依托新闻出版博物馆(筹)的团队,组织业界的政协委员、专业人士撰写回忆文章。经努力,共有55人撰写了59篇文章,总计约50万字。作为出版改革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所写的这一批文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借鉴意义。尤其对于行业的领导者和新进企业工作的年轻人,更有教育作用和借鉴作用。这项工作进行了两年有余,很多老出版人都参与撰稿,如巢峰、徐福生、江曾培、孙颢、杨益萍、李伟国、陈和同志等。不知不觉成书之时已是2018年的春天,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之际。这是一种巧合,但无意之中加重了这本书出版的分量。在此,我们谨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具体负责此书组织工作的祝君波同志、上官消波同志、张霞同志、章立言同志以及孙海燕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向上海市出版协会、上海市期刊协会、上海市书刊发行业协会的相关领导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儿童出版,我终生的事业 /张瑛文	1
百年《辞海》 /巢 峰	15
《良友》画报影印和出口台湾经过 ——兼怀赵家璧、郭小丹先生 /俞子林	23
改革开放后上海书店的出版工作与业务发展 /俞子林	30
我任《青年一代》主编 12 年 /夏 画	40
为文艺出版王国增添“新版图” /江曾培	52
以“裂变”方式建立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江曾培	79
上海三联书店成立的前前后后 /林耀琛	84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对外合作出版 /任 彦	93
时代的印迹 ——忆突击重排出版《数理化自学丛书》 /徐福生	99
人才是立社之本 /李国章	104
改革开放 梦想成真 ——记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外文图书有限公司的发展之路 /张瑞芷	111
学林出版社的自费出版 /雷群明	119





协作出版的始末与教训 /雷群明	127
上海香港三联书店的创建和发展 /樊秀珍	135
我参与的上海出版改革记事 /沈同华	143
发展变化中的上海旧书店 /吴明霞 殷小定 陈克希	151
我的译文记忆 /杨心慈	161
界龙发展回忆录 /费钧德	169
沪港出版界的合作与沪港出版年会 /陈志雄	186
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负责制试点追忆 /陈 和	195
《新学科丛书》:思想解放的产物 /陈 军	203
三上彼得堡 二进大巴黎 /李伟国	226
影印《四库全书》的决定和两岸争议 /李伟国	242
《世界人体摄影》出版始末 ——一个大社的专业实力和文化担当 /邓 明	254
上海出版改革中青年编辑成长记事 /曹维劲	271
关于上海出版专业职称(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变化进程的若干回忆 /孙 颢	280
十年成林 ——中国文化走向海外的一个案例 /孙 颢	284
《故事会》怎样打造成全国的出版文化品牌? /何承伟	308
我所经历的印刷改革 /杨益萍	325
孩子们心中的“大王” /沈振明	333
外语版《文化中国》丛书走出去工作的些许补充 /王有布	343



儿童出版,我终生的事业

张瑛文



张瑛文,1927年2月生。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会长等职务。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六个年头,我与少年儿童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儿社成立至今已65年,我与它相伴走过了37载的人生道路。依稀记得1989年被任命为少儿社社长时,看着宋庆龄题写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字样,我深深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心中激荡着“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豪情壮志。振兴少儿社、为少儿出版奋斗,成为我一生追求不懈的方向。

来到上海之前,我原本是在辽宁省团委工作,担任宣传科长。1955年在中央团校学习结业后,我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从编辑室副主任、办



公室主任开始,逐渐承担起社里的经营管理工作,先后担任经理部经理、副社长和社长。

改革开放从发行营销开始

我肩负起少儿社领导的职责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序幕逐渐拉开,在改革开放口号的激励下,全国人民热情奔放地做实事。我学习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后一直在琢磨:我们少儿社应该怎么做?

(一) 自办发行第一步

我和几位老出版同志互相交流意见,觉得从出版社编、印、发三个方面来看,编辑出书没问题,印刷除了纸张困难,其他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发行。因为书店发行所统一管理发行,出版社想多印一点,没有发货权,没法多印。我们一致认为:图书发行是出版社发展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从发行入手。

我建议上海市出版局出面给出版社一点发行权,副局长吉少甫同志很支持,而书店发行所则意见很大。于是,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讨论:如果让少儿社完全独立地做发行,发行所不管不问,少儿社还是有困难的,因为社里有 1000 多种图书,品种太多了,单凭一社之力做不了独家发行,还是先成立邮购部,在出版社门口设置门市部,可以对外卖书。

会后出版局慎重研究,发了一个文,同意出版社用辅助渠道补充主渠道发行的不足。辅助渠道有两种形式:一是同意出版社不通过发行所,完全独立地做图书发行;二是允许出版社成立邮购部和门市部。少儿社就采取了第二种自办发行的方式。

1980 年 3 月,我社邮购服务部开办,迈出了发行改革第一步。同时,我社在办公地门前开设了门市部,成立之日,我把上海出版社和发行所的领导都请来



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也来了。

过后不久,中央召开发行会议,我在会上介绍了自办发行的经验,得到与会同志们的重视。会后不久,文化部发文,批准各地出版社图书发行的决定权和图书的发行权。我的工作经验获得了认可和推广。

虽然我社有了一定的发行权,但同时也很注重与发行所的沟通,主渠道和辅助渠道互不影响,齐头并进。1991年,少儿社自办发行的码洋相当于1987年全年的总码洋数。

社里的门市部办好后,我没有裹足不前,而是萌生了到书店去商量特约经销的事宜。从1981年我成功争取到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上新华书店的特约经销专柜开始,少儿社的图书特约经销店逐步发展到50多个,遍布全国各地。在广泛设点的同时,也要注重每个点所产生的效益。于是,我们对特约经销店严格要求,要求品种齐全、销售码洋要高,所有特约经销店每年都要参加评比。

(二) 从“隔山买牛”到“看样订货”

除了为图书发行渠道开疆辟壤,我还在具体的发行管理工作中不断摸索创新。

20世纪80年代,信息传播渠道有限,出版社与书店的沟通交流不方便,书店难以清楚地了解各个出版社图书的具体信息。曾经有一次,不经意间我听到计划科同志提出“看样订货”的想法,就是说书店根据图书的内容、封面和开本来决定进货的数量。我一听就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决定大力支持。

经过筹划,1985年12月,我社与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在广东路新华书店招待所联合召开了首届少儿读物看样订货会。图书看样订货会是新鲜事物,属于全国首创,受到基层书店的普遍欢迎和赞同。不少书店的老业务骨



干、老经理太激动了,感慨地说:“我在书店做了几十年,一直凭征订单上的几十个字订货,内容提要太简单,有些看不懂,订货有很大的盲目性。过去曾要求出版社能够搞看样订货,实在不行发个封面看看也好,可是都做不到,这次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可以载入发行史册,给我们解决了‘隔山买牛’的大困难。”



1985年12月5日,少儿社与上海发行所联合召开首届少儿读物看样订货会,迈出了全国发行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展出图书108种

之后,在兄弟出版社的共同推动下,我社于1986年11月14日到17日在上海华山饭店主办了首届全国少儿社社长联谊会,有23家少儿社的社领导和发行科长共42位同志前来参加。会上我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新蕾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五社达成共识,共同宣布召开少儿读物

看样订货会,也欢迎其他出版社参加。

最终,在1987年11月1日到15日,五家少儿社分别在无锡(华东片)、武汉(中南片)、四川峨眉县(西南西北片)、天津(华北片)、长春(东北片)五地召开了“五社少儿读物首届看样订货会”,共展出500多种图书。那一届订货会规模不大,但每到一地都受到书店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订货会每年召开一次,从五家少儿出版社发展到15家出版社参加,订货会上图书品种多了,受到了全国书店的欢迎和好评。通过看样订货会,书店能够更好地选择图书、发行图书,带动了少儿读物销售的繁荣,而且全国各个少儿社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少儿读物出版质量的提升。

为了推动上海出版业的发展,上海的出版社也采取了各社联合的模式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交流信息、探讨业务。最初,上海市有12家出版社(上海人民社、上海科技社、上海教育社、上海文艺社、上海人美社、上海辞书社、上海译文社、少儿社、上海古籍社、学林社、上海书画社、中国大百科上海分社)在1986年9月17日成立了“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干部联谊会”(后正式改名为“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联谊会成立大会召开时,我出差不在上海,却被大家推选为会长。当时的副会长是史寿康,茅德林、王再生是正、副秘书长。联谊会还成立了社长经理组、出版组、发行组和财务组。

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干部联谊会的成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采取自定义程、自愿参加、自由讨论的方式,是个纯民间的组织。后在1991年7月12日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同意登记,协会得到了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至此,协会的会员单位已经由成立之初的12家增加到38家,囊括了上海所有的出版社。

在我担任协会会长期间,大力推广看样订货的图书发行模式。1987年5月24日,全国少儿出版社首届书市和上海出版社首届联合书市同时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当时的市领导江泽民、汪道涵、刘振元、陈铁迪、谈家桢、陈沂以及市委宣传部、市新闻



出版局的领导同志参加开幕式,由老市长汪道涵同志剪彩。由此开始,每年办一次沪版图书看样订货会,订货会由协会出面组成组委会,各社派一名领导参加,研究订货会重大事项,下设定货会办公室,各社轮流担任主持,负责具体工作。协会从 1989 年开始,还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发行研讨会,送书上门,举办地区性订货会、行业评比等。我们的改革对整个上海出版系统发行工作起到了切实的推动作用。

(三) 推广图书,发起“红读”活动

图书发行的改革总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步步推进。

1981 年 6 月发生了一件事:有关报社在报上推荐了某出版社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推动儿童阅读起了很大作用,这原本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当时出版社和书店没得到消息,以至于没有及时地提供图书销售,读者到了书店买不到书,读者意见很大,书店意见也很大,出版社感到很无奈。

我在召开座谈会时听说此事,就深入地思考起这个问题。在 1981 年 12 月,我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燕生同志去团中央找领导反映此问题。团中央很重视,当时书记处书记胡德华同志找来少年部的领导一起商讨办法。大家决定在全国开展一次读书运动,叫“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由团中央少年部联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新蕾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和中国少年报社八个单位联合发起。

1982 年 11 月 14 日,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了首届“红读”活动发奖大会,各省市团委领导、红领巾代表、八家发起单位领导都参加了大会。这项活动后来由国家教委、团中央、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主办,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红读”活动中,我社从 1982 年起每年有 10 种左右少儿读物被推荐给小读者。

经营承包责任制振奋人心

1988 年 8 月 5 日,上海市出版局和财政局约见各家出版社商议经营承包事



宜,也包括当时的少儿社。过去,一家出版社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都由国家、政府接受和承担,也就是说出版社是赚是亏都算国家的。后来,上海出版局和财政局提出,给出版社约定一个利润数,利润数会逐年增加,出版社完成了承包的数额,就可以按规定比例提取“利润留成”,而且超过的部分也归出版社,没有完成的话,就没有“利润留成”。

当时,我是少儿社的副社长,我向卧病在床的老社长陈向明请示。老社长鼓励我,让我大胆实干,以少儿社的能力完成承包的利润数问题不大。第二天,我就到出版局作出承诺,承诺努力完成承包的332万码洋利润,并且做到每年增加3%的利润。不久后,我被选为社长,挑起了社长管理经营承包的重担。

出版社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首先从科室承包责任制开始。

为了充分调动少年儿童出版社老、中、青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贯彻“两为”和高质量图书的出版方针,夯实“人尽其才”“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我分别组织民主党派、党员、科室干部、职工、离退休同志等100多位职工召开了十来个座谈会,又和30多位同志个别谈话,大家一起坐下来讨论如何振兴少儿社。同志们提出了很多出色的建议,其中有一条呼声很高,大家希望实行科室承包制,千斤担子一起挑。我和社领导班子共同商议,认真探讨,深入研究了科室承包制的内容、方式和有关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一) 以编辑室为核心的承包责任制

少儿社的承包责任制主要以编辑室为核心开展工作、具体执行。编辑室承包责任制主要包括四块内容:一是编辑室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社里确定的各项计划指标,诸如出书品种、发稿数量、质量等;二是实行编辑室毛利承包,超毛利有奖;三是调整出书结构,明确出书方向。少儿社的出书结构大体有四



类:第一类是双效益的图书;第二类是质量好、品种新,但经济效益目前不一定好的图书;第三类是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丛刊以及专家选集、全集等(属亏本书);第四类是一般化的儿童读物。原则上,要求编辑室努力发展前三类图书的出版,限制第四类图书的出版。四是根据各编辑室的业务范围,定任务、定编制、定科室负责人、定承包毛利数,明确增员不增工资,减员不减工资,可以吃差额工资。

商议和确定了改革内容之后,围绕该制度,少儿社开始执行具体措施。首先调整机构,实行双向组合,理顺人与人的关系。以编辑室为单位,由室主任负责宣布:本编辑室实行双向组合,愿意合作者在规定时间内相互表态。

(二) 理顺人员关系保障制度实行

双向组合之后,产生了一批富余人员。这些同志主要是由于有些部门人多事少而下来的,有的是自愿下来的,有的是在双向组合中,由于一方不愿意而退下来的,当然也有谁都不愿意要、组合不进去的同志。对这部分同志,社里反复强调,他们是有志气有才华的。

社里对富余人员采取了积极态度,想方设法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希望人尽其才。社里提供了很多方案供富余人员选择:可以在编辑室和个人双方愿意的基础上,充实到需要人才的科室;也可以组成推销员队伍分工包片去各地推销我社图书,送书上门,并根据国家规定获得一定数额的促销费;还可以成立编辑事务所,具体任务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报选题出书,必须是品种新、质量高、双效益的图书,或负责开展组稿活动,组织来的稿件社内有优先使用权,并付给一定报酬,若是推荐到兄弟出版社后被采用,也能获得一定报酬。此外,上述办法均不愿参加的同志,也可以自由组合,在国家和出版社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其他形式的承包。最后,经过上述办法都无法组合的个别同志,只好采取在规定时限内